

## 名师讲堂

## 学人关注

## ·编者按·

近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在京作了题为《家庭的祛魅与复魅》的学术报告,畅谈中国网络中流行的若干家庭“祛魅”的话语与学术界关于家庭“复魅”的话语。阎教授用“理性化”与“个体化”的理论廓清了“祛魅”的概念,讨论了中国知识界为家庭“复魅”的努力,分析了“新家庭主义”的内涵与其未来发展的展望,并和参会的与谈人一起交流了对中国家庭未来的期待。

■ 杨可 范颖

近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先生在京作了题为“家庭的祛魅与复魅”的学术报告,畅谈中国网络中流行的若干家庭“祛魅”的话语与学术界关于家庭“复魅”的话语,讨论“新家庭主义”的内涵与发展,并和参会的与谈人一起交流了对中国家庭未来的期待。

## 中国家庭的“祛魅”与“复魅”

阎教授首先用“理性化”与“个体化”的理论廓清了“祛魅”的概念。他认为,韦伯对公领域理性化有深刻洞见,但未涉及私领域尤其是家庭的理性化,二者有不尽相同的逻辑和后果,而韦伯几乎没有考察理性化的性别维度,尤其是女性对于理性化的态度。他认为,家庭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家庭地位的提升,这使得曾经笼罩在家庭生活之上许多牢不可破的观念逐渐松动乃至瓦解。他沿着这个思路简要梳理了家庭“祛魅”的中外历史,并以择偶为例,讨论了当今家庭理性化或说私人生活转型的具体路径。他认为,私人生活的理性化并不一定导致韦伯所谓的“铁笼”,而能够促成一种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的人格。但家庭理性化也有需要反思之处,就是在当代很多青年心目中,家庭正从一个集体利益的目标,转变为达到个人幸福亲密关系的手段。

阎教授继续讨论了中国知识界为家庭“复魅”的努力。他指出,“祛魅”的本意是使用理性驱逐加诸社会观念上的超自然神秘力量,一旦理性完成了“祛魅”,超自然神秘力量就完全不再被人们所相信。所以,所谓“复魅”,并非再度请回那些神秘力量,而是同样依据理性,把因“祛魅”而地位降低的社会观念重新塑造为令人信奉的。而所谓家庭的“复魅”,是一些学者目睹家庭的“祛魅”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家庭的社会评价降低后,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倡导时,对家庭的社会功能、作用、价值和意义进行带有肯定意味的反思。谈及家哲学研究、家国同构的社会理论研究、家庭韧性研究等研究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它们更多涉及总体的、抽象的、去情境化的家庭,与当今家庭面临的亲子关系紧张等具体问题有一定距离;在讨论代际团结、代际互助时,又较少谈及年龄、代际之间差异造成的紧张,而当前的家庭理性化已经引发传统家庭的代际绝对权威逐渐式微;一些研究也没有仔细探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问题。

## “新家庭主义”的七个特点

在讲座的最后,阎教授分析了“新家庭主义”的内涵与其未来发展的展望。“新家庭主义”为国内家庭研究学者康岚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阎教授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不断丰富“新家庭主义”概念的内涵,将其总结为以下七方面特点:重心转移、亲子一体、亲密转向、原生家庭、个体幸福、家庭成功、亲缘重组,并着重强调了讨论“新家庭主义”必须注意的三个要点:第一,“新家庭主义”呈现出“祛魅”与“复魅”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家庭的理性化导致了关于家庭的传统观念的松动;另一方面,包括“亲子关系”“原生家庭”等一系列新的话语的生成,家庭又被蒙上某种新的魔幻化意味,比如亲子关系因此而被赋予原来没有的意义,亲子关系替代了家庭关系导致家庭被窄化和被原子化。第二,“新家庭主义”建基于代际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与女性的家庭地位提高,尤其是女儿家庭地位的提高有直接关系。第三,“新家庭主义”既是不可持续的现象,也不是一个应被期望的现象。前者的原因在于,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代际之间在成长经历、人生目标、财富观念、幸福意识方面有了差异,“80后”以及更多的“90后”在整个新的代际协商、代际合作模式中,承担了太多的家庭的希望,从童年开始就充满了压力,如果失败,承受的内疚感、自责远远超出一代人。他们可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再重复父代对

子代做的事儿。而后者原因在于,“新家庭主义”下的代际团结、代际协作加强了东亚育儿文化中的家庭依附模式,延续了青年一代的心理断乳、社会断乳,有可能影响到新一代青年的独立自主人格、创造力和生产力。

## 对中国家庭未来的种种期待

在讲座之后的学术交流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刘汶蓉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肖素未副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赵立玮研究员、吴小英研究员、马春华研究员、徐宗阳研究员六位与谈人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分享了对阎教授讲座的思考,并从不同角度展望了中国家庭的未来。

诸位与谈人高度评价了阎云翔教授的家庭变迁/私人生活变革的历史视角,感谢他为整个家庭社会学研究带来的启发。赵立玮研究员指出,阎云翔教授基于中国婚姻家庭现实所做的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化工作一方面承接了中国化早期——民国以来社会学家研究和思考家庭的重要理论议题,另一方面也在经验层面观照到了我国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婚姻家庭的变迁。阎云翔教授引入的个体化概念虽然来自西方社会学理论,但他始终注意区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不同于西欧之处,提出了“没有个体主义的个体化”等概念,为中国家庭的婚姻和代际关系的变化给出了非常贴切地描述。

刘汶蓉研究员认为,阎云翔教授所呈现的当今青年一代对于家庭的“祛魅”态度,在自己最近作的城市青年婚恋调查数据中也有所体现。刘汶蓉研究员发现,很多复杂的原因使得当今的年轻人不愿意复制自己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与此同时,青年人对家庭加深了依赖,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择偶意愿方面,青年人都对父母的态度更为在意,他们需要父母的支持并愿意听取父母的意见。“亲子一体”在当前中国家庭中体现为培养成功的孩子而采取的种种努力,但即便做到这些似乎还是不能让家庭及其成员安心,不能带来足够的幸福感。

诸位与谈人建议,在对青年人话语实践和代际互动的考察之外,纳入国家福利政策、社会分层、城乡关系、个体生命历程等因素,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中“家庭”内涵的变迁与不变。肖素未副教授指出,国家在不同阶段用于满足家庭需求的策略有所区别,例如当前正是希望通过培育满足家庭各种新需求的市场来服务于家庭负担偏重的领域,比如家政、养老、育儿等方面。马春华研究员对比了西欧、北欧各国的福利政策,主张将家庭化/再家庭化的概念用于理解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家庭的个体化还是“新家庭主义”的兴起都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密切相关。徐宗阳研究员则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概念的弹性以及不同群体对家庭理解的差异,这些理解差异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家庭的精神内核,这可能对于思考家庭的“祛魅”与“复魅”很有关系。青年一代对家庭的不满与苛求可能是某一年龄阶段的特性,当他们度过这个年龄阶段有了新的人生体会,可能会回归到亲近家庭的态度上来。

面对中国家庭未来发展的种种期待,吴小英研究员特别感谢阎云翔教授这场精彩的学术分享给家庭社会学理论发展所带来的启发与贡献。她指出,在家庭现代化理论难以与中国家庭变迁的实际经验契合之时,阎教授对“新家庭主义”的研究给中国家庭研究界带来了惊喜。本次讲座又进一步澄清了对“新家庭主义”的一些误解,指出了“新家庭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以及这背后可能存在的道德的、理性的和文化意义上的风险。同时,阎云翔教授在本次讲座中分享的中国家庭的依附性关系的讨论是特别具有洞察力、反映本土文化特色的观察,值得结合中国百年来关于青年个体与家庭之关系的论争加以进一步探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 阅读提示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是当代民俗学者刘宗迪对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文化的研究专著。该书作者从浪漫星空的牵牛星、织女星开始,纵横开阖,跨越文学、历史学、天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学科知识与范畴,引经据典,以多重视角聚焦七夕传统节日的流变与文化内核,揭示了七夕节日的女性属性和异域渊源。

■ 李亚妮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是当代民俗学者刘宗迪对中国传统节日“七夕”的研究专著。原版名为2013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行的《七夕》,是“节日中国”丛书的一种。该书从浪漫星空的牵牛星、织女星开始,纵横开阖,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宗教等学科,越汉魏、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引经据典,辨伪去妄,小巧而精致地呈现了七夕文化的流变与文化内核,观点新颖,颇有价值。

## 七夕流变的历史概貌

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已久且家喻户晓,对牛郎织女故事流变的研究也未曾中断。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牛郎织女故事最早归为“牛郎型”或“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年,现代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发表了《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文,从纵向的历史演变和横向的各地流传本类型故事比较两个角度,全方位论述了该故事类型在中国流变情况,成为该类研究的经典之作。

刘宗迪的《七夕》一书并未拘泥于故事类型的结构化研究,而是从史学角度,从先秦魏晋到唐宋明清,从探究牛郎织女故事和七夕文化的起源到七夕节日的确立,乃至宋代七夕文化的异域渊源,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七夕拜魁星风俗的跨文化研究,深入阐释了七夕文化元素的变迁。在历史流变的爬梳剔抉中,刘宗迪对七夕文化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变迁也有涉及。特别是对宋代七夕风俗及东南沿海拜魁星风俗的异域渊源进行探索,链接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层叠与变迁,为七夕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价值。

同时,刘宗迪对七夕节日内容的变化也作了详细梳理。借助各类地方志、史志、民俗风土志等文献资料,以及宫廷诗人、文人墨客对七夕节日的诗词赋文,从三国时期《风土记》中的乞富乞寿乞子到南北朝《荆楚岁时记》中的乞巧,清晰呈现乞巧节的仪式内容和象征意义的日臻丰富。由此可见,乞巧节不单是牛郎织女重逢的爱情故事,也不单是农妇开始纺织的劳作故事,而是与其他节日一样,是全国上下宫廷与民间狂欢的仪式活动,也是文人墨客文化交流的场域。

## 七夕文化的多学科探索

多学科跨文化视角也是《七夕》一书的一大亮点。这与作者的学术专业与学术兴趣相关。刘宗迪有气象学、文学、民俗学与跨文化交流研究等多元专业的教育与学术训练背景,他常以研究问题而非所学专业为中心。如他所言:“人文领域,没有任何问题是能够靠一个学科的知识解决的。”在《七夕》这本书中,作者跨越了文学、历史学、天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学科知识与范畴,引经据典,辨伪去妄,对有关七夕的文献记载进行梳理分析。这与他的“天书三部曲”的《山海经》研究方法论相一致。

七夕节的文化元素丰富多元,既有爱情的珍贵和离散的忧伤,也有对女性社会期待的寄托。刘宗迪跳出单一的社会文化学和民俗学的分析,结合天文、农事、时令、物候等知识,探寻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及七夕节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七夕乞巧节和牛郎织女故事的来历,归根结底都与星象纪时制度有关。如《夏小正》中将农历七月夏日银河西畔的星象命名为“织女星”,且被作为七月的重要天象记录下来。织女星的命名,实则与农历七月女性开始纺织有关,将民

间故事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凸显了七夕文化元素中的物质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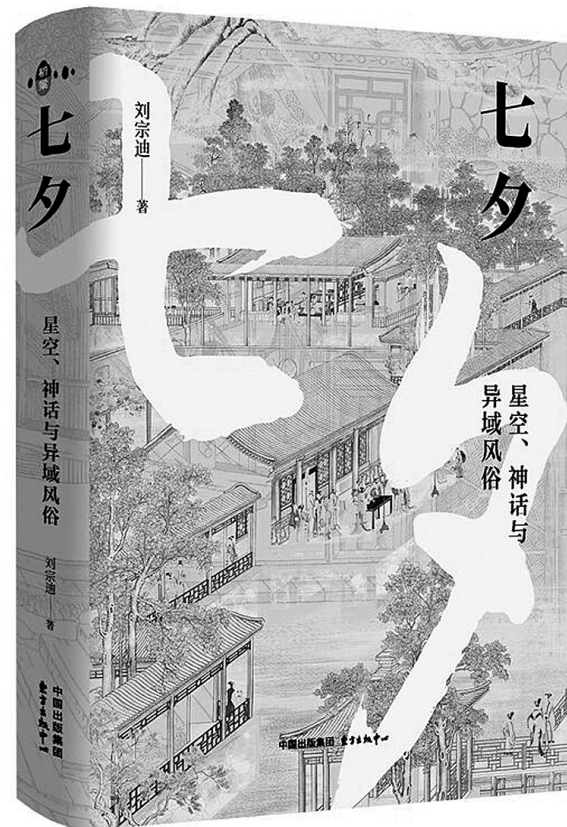
自宋代以来,城市逐步形成并蓬勃发展,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七夕风俗更加多元。特别是北方汴梁七夕风俗中的泥孩儿摩睺罗和东南沿海地区流行七月七日拜魁星风俗,这与中原地区传统的乞巧风俗很不同。刘宗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借助考古资料、佛经典籍以及民俗资料等,深入分析这些文化现象与西亚波斯文化的关联,并与传统的中原文化进行比较和探究,弥补了对七夕文化起源与流变的跨文化研究,也为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 七夕节日的女性属性

刘宗迪在书中多处提到,七夕乞巧节是一个女性为主角的节日,仪式的主要参与者是女性,从种生到乞巧,都是女性在参与。但是,作者并没有大篇幅赞扬七夕节的伟大,也没有挪揄七夕节为女性提供的施展空间。作者科学客观地指出虽然七夕节的活动主体是女性,但有关七夕诗文辞赋的作者,大多是男性,女性作者群体是缺失的。“七夕乞巧,女子之事,但写七夕诗的却都是些须眉男子。女子是表演者,而男人是观看者,这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学一以贯之的格局。其实男人笔下的女性,也往往只是他们自己对女性的想象和欲望的投射而已,就像京剧、昆曲中千娇百媚的花旦,只是男人假借女人的头面顾影自怜。”

七夕文化中女性作者的集体缺失和女性被凝视的地位是与其他传统文化相一致的。但在本书中,对该问题的探讨仍然限于表层,并没有深入分析。如书中较少收录或分析古代女性诗人或民间故事中关于七夕节的诗词或故事;牛郎织女故事流变分析中缺乏对织女形象变迁的深入分析;缺乏对现代女性参与七夕节的情感体验的田野调查。这一点作者也曾感叹:“无法真切地了解那些七夕之夜在香案前向织女默默祈祷的女子们所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心愿。”

瑕不掩瑜,《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仍不失为系统研究七夕文化的新力作,打开了多学科研究传统文化的新格局,同时也为传统节日中女性角色和身份研究提供了跨文化视角和史料空间。



## 阎云翔:『新家庭主义』的内涵与发展

## 研究视窗

## 《正确认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核心要义及其价值追求》

作者:李明舜

本文作者提出,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和男女平等都是我国的重要法律原则;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是促进男女平等实现的必要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必须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 《人工智能时代女性算法素养培育研究》

作者:刘静 吴丹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使用的负面效应逐渐被披露,算法应用背景下的性别偏见、女性权益保障话题也备受关注。从性别视角研究算法素养培育问题,有利于找到女性用户算法素养培育的切入点并提出女性算法素养培育策略。本研究梳理了国内外女性算法素养培育实践,通过在线实验采集了616份样本,分析并验证了启发式介入措施对女性用户算法素养培育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通过启发式介入措施的学习,相较于男性,女性用户算法素养水平得到了更为显著的提升,其原因主要在于女性用户算法感知水平的提升。以此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女性算法素养培育策略。

来源:《女性发展论坛》2024年第1辑

## 《中国女性学学者的群体特质、成长逻辑及其教育意蕴》

作者:尚宇菲

学人研究是理解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建设与人才质量提升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学人的群体特质和成长逻辑能够有效转化为育人资源。以中国女性学学者为研究对象,本文作者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其学术经历与治学经验发现,中国女性学学者的群体特质集中表现为问题意识、性别观照、关系性思维,她们遵循“社会化发展”与“合法性追寻”的成长逻辑。这种育人理念与育人方法对女性学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启迪意义。可以通过深化学人专题研究和加强人际互动的方式,将女性学学者的群体经验转化为育人资源,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实习生毕然 整理)